

「主」三欽差等編纂 周勛初等校訂

冊府元龜

校訂本

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

冊府元龜

校訂本

壹

卷一至卷九〇

帝王部（上）

〔宋〕王欽若等 編纂 周勛初等 校訂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冊府元龜:校訂本/(宋)王欽若等編纂;周勛初等
校訂. —南京:鳳凰出版社,2006. 12
ISBN 7—80643—586—7

I. 冊... II. ①王... ②周... III. 百科全書—中國
—北宋 IV. Z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6)第 140359 號

冊府元龜(校訂本)

著 作 者 (宋)王欽若等編纂 周勛初等校訂
責任編輯 卞 岐 常寧文 王華寶 王 劍 馮保善

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鳳凰出版社(原江蘇古籍出版社)
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
發行部電話 025—83223462
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
印 刷 者 金壇古籍印刷廠
金壇市晨風路 186 號 郵編 213200
開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張 830
字 數 15777 千字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標準書號 ISBN 7—80643—586—7/Z·57
定 價 3000.00 圓(全十二冊)

(鳳凰出版社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)

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專刊

國家“985 工程”“漢語言文學與民族認同”哲學社會科學
創新基地項目資金資助

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項目

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

江蘇省“十一五”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

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
冊府元龜整理工作委員會

主 編 周勛初

副 主 編 姚 松 武秀成

校訂人員 (以姓氏筆畫爲序)

王 青	王一涓	王華寶	成 林
束有春	周勛初	武秀成	姚 松
陳書祿	陳建生	徐興無	高民凱
曹 虹	張宏生	張民權	張亞權
景凱旋	程章燦	許 結	蔣 寅
趙 益	鞏本棟	歐陽健	錢興奇
嚴 杰			

第一冊校點人員

趙 益(卷一——四八)

曹 虹(卷四九——九〇)

前言

周勛初

關於《冊府元龜》一書的編纂情況，程俱《麟臺故事》卷三下《修纂》曾有介紹：

景德二年九月，命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王欽若、右司諫知制誥楊億修《歷代君臣事迹》。欽若等奏請以太僕少卿直秘閣錢惟演，都官郎中直秘閣龍圖閣待制杜鎬，駕部員外郎直秘閣刁衍，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，右正言秘閣校理龍圖閣待制戚綸，太常博士直史館王希逸，秘書丞直史館陳彭年、姜嶼，太子右贊善大夫宋貽序，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同編修。……初命欽若、億等編修，俄又取秘書丞陳從易、秘閣校理劉筠。及希逸卒，貽序貶官，又取直史館查道、太常博士王曙，後復取直集賢院夏竦。又命職方員外郎孫奭撰《音義》。凡九年。至大中祥符六年（1013年），成一千卷上之。總三十一部，部有總序；一千一百四門，門有小序。又《目錄》、《音義》各十卷。上覽久之，賜名《冊府元龜》。（《四部叢刊》續編影印明景宋鈔本）

上述諸人，《宋史》中大都傳，可見這是一部集中了當日學界精英而編成的巨著。

《冊府元龜》所錄材料，先按部門再依年代先後排列。“總序”“小序”都從歷史演變着眼，闡發部門政制的原則。序文由李維、錢惟演、劉筠、夏竦、陳彭年等負責撰就，後由楊億定稿。可知全書的結構相當完整，編纂之前曾作精心設計。

宋太宗趙光義曾命臣下編過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太平廣記》、《文苑英華》三書，與真宗趙恆囑令編就的《冊府元龜》合稱四大書，其中《太平御覽》、《文苑英華》、《冊府元龜》均達一千卷之多，《太平廣記》則為五百卷。前三書的卷數雖一樣，但《冊府元龜》每一卷的容量要比其他二書為大，估計總字數要比《太平御覽》多一倍，約有一千餘萬字。這在《四庫全書》所收的幾種篇幅巨大的書中，僅次於《佩文韻府》而位列第二。

《冊府元龜》的宗旨

《宋史·藝文志序》：“唐之藏書，開元最盛，爲卷八萬有奇。然亂離以來，編帙散佚，幸而存者，百無二三。”宋室初建，隨即着手整理文獻，分類編纂，以便保存。宋眞宗爲《冊府元龜》製序，叙其經過頗詳，此序今佚，《玉海》卷五四《承詔撰述·類書》錄《景德冊府元龜》引御製序曰：

太宗皇帝始則編小說而成《〔太平〕廣記》，纂百氏而著《〔太平〕御覽》，集章句而製《文苑〔英華〕》，聚方書而撰《神醫〔普救〕》；次復刊廣疏於“九經”，校闕疑於“三史”，修古學於篆籀，總妙言於釋老。洪猷丕顯，能事畢陳。朕遵先志，筆振斯文，載命群儒，其司綴輯。粵自正統，至於閔位，君臣善迹，邦家美政，禮樂沿革，法令寬猛，官師論議，多士名行，靡不具載，用存典刑。

宋眞宗命編此書的用意既明，其與前時三大書的一些原則差別亦可藉以窺知。

宋眞宗趙恆繼承其父太宗光義的事業，編纂《冊府元龜》一書，似乎也重在保存文獻，實際上情況已有根本不同。這從《冊府元龜》一書書名的變化上可以看出。

此書原名《歷代君臣事迹》，後來才改名《冊府元龜》。這番改動，說明眞宗的指導思想更趨明確。原先他只想追蹤先朝，編一部有關歷代君臣事迹的大書，顧名思義，可知這只是一部有關政事的資料書，主題雖與前朝三書不同，性質則無大異。“冊府元龜”一名的情況就不同了。“元龜”者，大龜也。古時以龜爲靈物，三代之時，有大事則以占卜定吉凶，求行事的指導，因此此書改名“冊府元龜”，表明其着眼點已不僅放在纂輯歷代君臣事迹上，而是注意提供可供借鑒的資料，以便從中汲取治國的經驗教訓。這樣的一種“冊府”，所包容的內涵，也就起到了治國指針的作用。

每一部書都有它的主題思想，但像《太平廣記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文苑英華》等書，彙纂前代著作而成，帝王的用意不顯。或許宋代開國君主趙匡胤與光義二人乃武人出身，文化水準不高，故而目的重在保存文獻，而對扭轉唐末五代以來的混亂思想還未顧及。眞宗代起，這一任務也就提上了議事日程。

我國古代把《太平御覽》和《冊府元龜》都歸入“類書”類。若將二者作一比較，可知性質頗爲不同。《太平御覽》的內容屬於百科全書式的彙纂之作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蟲魚鳥獸，無不兼采。《冊府元龜》則純屬政治方面的典籍，凡博物方面的具體知識，概不錄入；即使是一些政治制度方面的內容，如本應采入《國史部》內的“儀注”“職官”等問題，因爲可起鑒戒的作用太小，也不載錄。書中着意提供的，是有關政治與體制方面

的一些重大問題。

《太平御覽》以蜀、吳、五胡十六國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北齊爲偏霸，置《偏霸部》，秦與東魏、北周入《皇王部》，《冊府元龜》則以秦、蜀、吳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東魏、北齊、後梁爲閏餘，入《閏位部》；十六國及五代中之十國，另立《僭僞部》。由此可見，宋真宗時史學中的正統觀念正在樹立之中。《太平御覽》乃採用前代的史料編纂而成，觀點也大都沿襲前人，《冊府元龜》編者重行甄別，體現了宋代的歷史正統觀點。其後歐陽修編《新唐書》，私撰《五代史記》，這種史觀更見完整了。

洪邁《容齋四筆》卷十一《冊府元龜》記編修官曾向真宗上言，議及引用材料等事，文曰：

近代臣僚自述揚歷之事，如李德裕《文武兩朝獻替記》、李石《開成承詔錄》、韓偓《金鑒密記》之類；又有子孫追述先德，叙家世，如李繁《鄴侯傳》、《柳氏序訓》、《魏公家傳》之類；或隱己之惡，或攘人之善，並多溢美，故匪信書。并僭僞諸國，各有著撰，如僞《吳錄》、《孟知祥實錄》之類，自矜本國，事或近誣。其上件書，並欲不取。餘有《三十國春秋》、《河洛記》、《壺關錄》之類，多是正史已有；《秦記》、《燕書》之類，出自僞邦；《殷芸小說》、《談藪》之類，俱是談諧小事；《河南志》、《邠志》、《平剡錄》之類，多是故吏實從述本府戎帥征伐之功，傷於煩碎；《西京雜記》、《明皇雜錄》，事多語怪；《奉天錄》尤是虛詞。盡議采收，恐成蕪穢。

上述諸書，顯然不合編寫《冊府元龜》時真宗提出的政治標準，因而遭到了否決。

中國的史學傳統，重在褒貶，“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亂臣賊子懼”。因此古代修史之時，特別注意對某一些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表揚和批判，藉以樹立準則，垂示後人。《冊府元龜》的編纂，正是這一史學傳統的體現。

宋真宗親自過問這件大事。《玉海》卷五四上記載：“景德四年九月戊辰，上謂輔臣曰：‘所編《君臣事迹》，蓋欲垂爲典法，異端小說，咸所不取。觀所著篇序，援據經史，頗盡體要，而誠勸之理，有所未盡也。’欽若等曰：‘自續集此書，發凡起例，類事分門，皆上稟聖意，授之群官，間有凝滯，皆答陳論。今蒙宣諭，動以懲勸爲本，垂世之急務也。’”又載“〔祥符元年〕五月甲申手札：詔凡悖惡之事，及不足爲訓者，悉刪去之。日進草三卷，帝親覽之，隨其舛誤，多出手書詰問，或召對指示商略。”可見他對編寫原則的重視和堅持。

宋真宗“指示商略”之事，尙有不少文字保存下來，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六二載：

〔景德三年四月〕丙子，幸崇文院觀四庫圖籍及所修《君臣事迹》，遍閱門類，詢其次序，王欽若、楊億悉以條對，有倫理未當者，立命改之。謂侍臣曰：“朕此書蓋欲著歷代事實，為將來典法，使開卷者動有資益也。”賜編修官金帛有差。

宋真宗不但作原則指示，而且在閱讀過程中，通過某些史料的去取，進一步闡明自己的意圖，例如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卷六五載：

〔景德四年四月〕丁丑，上謂王欽若等曰：“近覽《唐實錄》，恭宗即位，坐朝常晚，群臣班於紫宸殿，有頓路者。拾遺劉栖楚切諫，叩龍墀不已，宰臣宣諭乃退。恭宗為動容，遣中使慰勞。諫臣舉職，深可獎也。而史臣以逢吉之黨，目為鷹犬，甚無謂也。今所修《君臣事迹》，尤宜區別善惡，有前代褒貶不當如此類者，宜析理論之，以資世教。”

“恭宗”即唐敬宗李湛，宋避太祖之祖趙敬名諱而改。此事發生分歧的焦點，是對劉栖楚的為人有不同評價。史稱劉栖楚為奸相李逢吉的黨羽，名列所謂“八關十六子”中，所以史臣將之加以貶斥。實則劉栖楚的情況甚為複雜，《因話錄》卷二載其任京兆尹時事，誅罰不避權勢，趙璘曾予高度評價。《資治通鑒考異》卷二十叙八關十六子，司馬光按：“栖楚為吏，敢與王承宗爭事，此乃正直之士，何得為佞邪之黨哉！”即以上述事例而言，亦可稱為骨鯁之臣，宋真宗提出的處理意見，是可取的。《冊府元龜》卷五四八《諫諍部·強諫門》即遵旨錄入。

又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卷七三載：

〔大中祥符三年〕五月辛巳，內出手札示編修《君臣事迹》官曰：“張楊為大司馬，下人謀反，輒原不問，乃屬之《仁愛門》，此甚不可者。且將帥之體，與牧宰不同。宣威禁暴，以刑止殺，今凶謀發覺，對之涕泣，愈非將帥之事。《春秋》息侯伐鄭，大敗，君子以為不察有罪，宜其喪師。今張楊無威刑，反者不問，是不察有罪也。可即商度改定之。”

此事原出《三國志·魏書·張楊傳》裴松之註引《英雄記》。張楊，東漢末年人，建安元年拜大司馬。雖然史書對他曾有好評，然以此事而論，是非不分，實為庸懦，已經失去將帥治軍的原則，所以宋真宗要叫編修官重新考慮。今此事已從卷四一二《仁愛門》中刪除。

由上可知，宋真宗編纂《冊府元龜》的目的，是要統一人們的政治標準，樹立符合

宋代政權需要的價值觀念。每一個新的王朝的建立，都會遇到如何收拾前代殘局的問題。唐末政治混亂，再加上五代十國長期的政治混亂，封建社會中依據儒家學說而確立的一些社會準則，已經失去約束力，人們思想上很混亂，例如對待馮道這樣的一位“長樂老”，該怎樣評價，大家的看法就有分歧。價值標準不一，則社會秩序就難於穩定，因此宋初帝王過問此事，也是勢所必至之事。

宋真宗集中當時最負盛名的一批文士編纂《冊府元龜》，目的就在通過歷史事例重新樹立儒家確定的準則，故在編纂的體例上，也要參照《春秋》史法。《玉海》卷五四載：

王欽若以《南·北史》有索虜、島夷之號，欲改去，王旦曰：“舊史文不可改。”趙安仁曰：“杜預註《春秋》，以長曆推甲子多誤，亦不敢改，但註云日月必有誤。”乃詔：欲改者註釋其下。

這樣的處理方式，無疑是恰當的。不輕改史文，也是我國史學的一種優良傳統。

《冊府元龜》的價值

宋真宗敕纂《冊府元龜》的宗旨既明，此書的性質也就清楚了。

後人對於此書頗多批評，實多由於未曾注意此書宗旨。

上面已經提到洪邁從史源的角度曾對《冊府元龜》提出批評，《容齋四筆》卷十一《冊府元龜》中介紹了編修官向真宗上言，以為雜史等材料多不可信，故不宜采錄此中材料，洪氏以為不然，隨即舉司馬光修《資治通鑑》之事為證：

如《資治通鑑》則不然，以唐朝一代言之：叙王世充、李密事，用《河洛記》；魏鄭公諫爭，用《諫錄》；李絳議奏，用《李司空論事》；睢陽事，用《張中丞傳》；淮西事，用《涼公平蔡錄》；李泌事，用《鄭侯家傳》；李德裕太原、澤潞、回鶻事，用《兩朝獻替記》；大中吐蕃尚婢婢之事，用林思《後史補》；韓偓鳳翔謀畫，用《金鑾密記》；平龐勳，用《彭門紀亂》；討裘甫，用《平剡錄》；記畢師鐸、呂用之事，用《廣陵妖亂志》，皆本末粲然。然則雜史、瑣說、家傳，豈可盡廢也！

洪邁的意見自然也是正確的。但他應該注意到，《冊府元龜》和《資治通鑑》二書在材料的處理上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差異，正因二書視角有所不同之故。《冊府元龜》的

重點不在考訂史事，而是通過經、子、正史中的史實提供鑒誠。每一種書的編撰都有它特定的目的，洪氏從考訂的角度對《冊府元龜》提出要求，當然會有不滿了。

《玉海》卷五四中記載宋真宗指示編纂《冊府元龜》的原則是“異端小說，咸所不取”，又詔“凡所錄以經籍爲先”，編務的總負責人楊億具體申述道：

群書中如《西京雜記》、《明皇雜錄》之類，皆繁碎不可與經史并行，今並不取，止以《國語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管》、《孟》、《韓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韓詩外傳》與經史俱編。歷代類書，《修文殿御覽》之類，采摭銓擇。

楊氏叙及的著作，今日都很容易看到。《修文殿御覽》固已遺佚，但太宗時編《太平御覽》，也已采摭過不少材料入內，因此憑藉當時學者的介紹以及讀者翻檢時得出的初步印象，容易得出上述結論。

宋袁氏《楓窗小牘》卷下曰：

《冊府元龜》凡一千卷，三十一部、千一百四門。門有小序，撰自李維等六人，而竄定於楊億。其書止采六經、諸史，《國語》、《國策》，管、安、孟、晏，《淮南》、《呂覽》、《韓詩外傳》及《修文御覽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》等書，即如《西京雜記》、《明皇雜錄》等皆擯不采。……凡八年而成，然開卷皆常目所見，無罕覓異聞，不爲藝家所重。

這種看法不符實際。實則《冊府元龜》中包容着很多不見他書的珍貴資料，具有他書無法代替的價值。今分三點加以敘述：

（一）史料學上的價值

我們首先對材料問題作些分析。編纂《冊府元龜》的目的既是爲了取得歷史鑒誠，那爲什麼不純取正史，還要從經、子中去取材呢？

了解古代史書情況的人都知道：所謂“正史”，指的是歷代朝廷奉爲正體的紀傳體史。自《史記》起，每一個王朝都有所撰述，一直延續到清代。只有《史記》一書屬於通史。司馬遷從黃帝叙起，一直記載到漢武帝時。此書叙夏、商、周三代之史，因受材料局限，嫌敘事過簡，這樣宋代編纂《冊府元龜》之時，也就不得不從經、子中取材了。

劉昫領銜編纂的《舊唐書》二百卷，薛居正領銜編纂的《舊五代史》一百五十卷，宋真宗時已經行世，而作爲二書史料來源的唐五代帝王實錄與國史，以及詔敕章奏、諸

司吏牘等尙多存在，諸臣修《冊府元龜》時，時而徑引原始材料。《舊唐書》中采入上述材料，往往經過剪裁，《冊府元龜》則每全行錄入。因此，若把《冊府元龜》與《舊唐書》作比較，可以發現前者記載的內容往往比較詳盡。例如文宗大和五年王守澄、鄭注陷害宋申錫之事，《冊府元龜》記之於卷六七〇《內臣部·誣構》，其中詳記王守澄奏本內捏造的許多情節，比之兩《唐書》與《資治通鑒》中的記載，要詳盡得多。

岑仲勉《唐史餘瀋》卷四有《〈冊府元龜〉多采〈唐實錄〉及〈唐年補錄〉》一條，對此亦有具體論證。岑氏據《冊府元龜》卷九七九則天長壽三年二月西平大長公主還蕃條下註文：“按《唐書》太宗貞觀十五年，文成公主出降吐蕃弄贊，至高宗來降（永隆之訛）元年，公主卒，《實錄》所載西平大長公主，檢和親事迹未獲。”可證這裏采的是《實錄》中文，可補正史之闕。岑氏又據《冊府元龜》卷七〇八狄兼謩條下註文：“按《唐書》本傳不載此事，《唐年補錄》有此詔而不載兼謩等本官。”可證這裏采入的是《唐年補錄》中文，亦可補正史之闕。宋初直承唐、五代時，史料保存較多，《冊府元龜》中所采入者，後代或已遺佚，因而更見可貴。

由於《冊府元龜》條文之下不註原出處，後人難以發現這些文字是否出於正史之外，但如勤作比較，定能發掘出很多珍貴的史料。除有關歷史事件的記敘外，有關典章制度等方面，也有很多原始資料，為《通典》、《唐會要》等書所缺載者。即或有之，則在文字的詳略等方面每有出入，可以據之互校或互補。

（二）校讎學上的價值

《冊府元龜》中依據的正史，從版本的角度來說，都是比之目下流行之本更為接近原書面貌的古本。因此，就以一般的正史材料而言，也有校勘學上的價值。

《冊府元龜》中的材料，可用以補史、校史與輯佚。

清代校讎學家在古籍整理方面成就至巨，但由於對《冊府元龜》存在偏見，未能廣泛利用，這就限制了他們的成就。即如四庫館臣之纂輯《舊五代史》，本可大量利用《冊府元龜》中的材料，但他們不加利用，而把主要力量放在開發《永樂大典》上。《永樂大典》中的材料固然可貴，但此書畢竟是明代鈔本，不像《冊府元龜》中的材料，好多地方保存着五代之時史料的原貌。四庫館臣未加利用，實為可惜。

近代學者利用《冊府元龜》補史的範例，是陳垣據之補《魏書》缺頁事。

魏收所撰的《魏書》，自唐代以來，就有殘缺。明清兩代所刻的《魏書》，均出宋蜀大字本，該本也有殘缺。清代殿本《魏書》於卷一〇九《樂志》內註“缺一版”，但卻無法補足。嚴可均輯《全後魏文》卷三十八內錄劉芳上書言樂事，引《魏書·樂志》僅一行，下註“原缺一頁”；盧文弨撰《群書拾補》，於《魏書》此頁亦認為“無從考補”，僅從《通典》

補得十六字。陳垣據《冊府元龜》卷五百六十七補足全文，彌補了前此諸家的缺憾。

自從陳垣利用此書在校讎學上作出了重大貢獻之後，學術界對此書的看法大為改變。建國之後，中華書局組織專家點校二十四史時即已注意利用《冊府元龜》補史。按《魏書》原缺三頁，如上所言，殿本於《樂志》內註“缺一版”，因而引起了後人的注意，卷一〇八《禮志》四之四、一一一《刑罰志》內亦各缺一頁，傳世各種《魏書》均如此，但因無提示，且缺文處前後文字似相銜接，故未引起人們注意。中華書局點校《魏書》的專家據《冊府元龜》卷五八一補入三百二十五字，《禮志》之文始足；據卷六一五補入三百十七字，《刑罰志》之文始足。這些都是補史方面取得的良好成績。

宋代之前的幾種正史，僅靠鈔本流傳，容易出現缺頁和誤寫等情況，依靠後出刻本對校，往往難於解決問題。《冊府元龜》中容納着大量宋代之前的古本，其材料每多優於目下流傳本子，用作校讎，可以解決很多前人未曾涉及的問題。這一點，有待後人續作細緻發掘。

（三）學術史上的價值

我國具有悠久的史學傳統，但偏重於政治史方面的編纂，而對其他門類的學術史，則相對來說不太重視。以正史而言，《史記》中有八“書”，後代史書也大都有分門別類的各種“志”，敘述各類學術的源流演變和在本朝的具體情況，但在紀傳體中，僅能占有一定的比例，篇幅不可能太多，敘述的內容也就必然有局限。

自唐代起，始有政書一類著作，如《唐會要》，記載一個朝代的法度典章；如《通典》，則通古今而論之。諸書均分門別類，記敘這些門類的沿革和現狀。其後各個朝代均有這類著作，保存了豐富的文獻資料。

《太平御覽》等類書中，也包含着各種各樣的學術門類，系統地積累了相關材料，便於人們檢索。但這類類書，終因門類過多，內容分散，在某一專題內積累的材料，也就不可能太多。

《冊府元龜》容量大，對於各類問題，資料的搜集更見完整，編纂更有系統。利用《冊府元龜》中的材料，可以分門別類地編寫成多種專題歷史。

就以史學而言，大家都知道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，有人將我國古代文化徑稱之為史官文化，但這一傳統怎樣形成，怎樣發展，卻不易找到相關材料，獲得系統知識。劉知幾《史通》中於此有所論述，但劉氏着眼於理論闡發，並不把力量放在提供系統的資料上，因此無法滿足後人獲得完整的史學史知識的要求。

《冊府元龜》的情況不同，《國史部》中細析之為十三門：選任、公正、恩獎、採撰、論議、記注、譜牒、地理、世官、自序、疏謬、不實、非才，這樣也就分門別類地提供了有關

史學史上的大量原始材料，後人如欲進行史學史的編纂，從中可以不費力地取得大量有用的材料。

有的問題，由於特定的背景和條件，古人甚為重視，在歷史上發生過重大影響。如譜牒之學，凡是研究漢至唐宋文史者，不可不有所了解。但過去的史書上於此沒有系統記載，也很難找到其他材料來參考，要想獲得完整的認識，有一定的難度。《冊府元龜·國史部》中有《譜牒門》，收集了六十二條材料，閱讀這些長編式的記敘，可對古時譜牒的形成與發展獲得完整的認識。

我國古代在選任官吏上最早建立起一整套的用人制度，對世界各地都曾發生過巨大的影響。《冊府元龜》中有《貢舉部》，內分條制、考試、科目、對策、應舉、清正與謬濫七門，每一門中都收集了豐富的有關資料。讀者如欲了解歷代帝王求賢用人的事例，就可到《條例門》中去尋找；如欲了解歷代考試的制度，就可閱讀《考試門》中的材料；如欲了解歷代考試的具體科目，就可閱讀《科目門》中的材料，……假如有人要想撰寫古代的貢舉史或科舉史，那麼可從《冊府元龜》中找到豐富的相關材料，這為科學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。

如上所言，《冊府元龜》全書共有三十一部，一千一百零四門。而據今人統計，明刻本《冊府元龜》中已分為一千一百一十五門。這就為千百種分門別類的專題研究提供了系統的素材，於此也可看出它在學術史上的價值。

《冊府元龜》的整理

《冊府元龜》編纂完成後，隨即奉命刊版。宋真宗天禧四年（1020）曾賜輔臣各一部，宋仁宗景祐四年（1037）曾命賜御史臺，但這部北宋祥符初刻本早已全部失傳，前此公私書目中無系統記載。

目下人們所能見到的宋本《冊府元龜》，均為南宋時期的蜀刻本。一種題《新刊監本冊府元龜》，半葉十三行，行二十四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這一刻本僅存八卷，計為卷249、251、252、253、254、261、262、279，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；另一種書名前無“新刊監本”字樣，為南宋中期眉山刻本，半葉十四行，行二十四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這一刻本現存五百八十八卷，計為卷6～10、41～45、56～60、129～166、171～180、182～204、271～275、286～295、307、309、341～345、356～375、386～390、396～400、411～415、442、444～460、471～475、482～485、491～495、505～538、545～577、583～599、604、605、608～660、666～701、706～708、717～720、726～732、737～739、742～756、761～791、796～800、803～806、811、812、815～865、876～933、936～938、940～942、944～

947、950~956、967~1000，分藏日本靜嘉堂文庫、臺灣中央圖書館、北京國家圖書館、北京大學圖書館。共計五百七十三卷，內有重出者十五卷，故以存世之書冊總數計，共有五百八十八卷。若以存世之卷數計，上列五百七十三卷，加上“新刊監本”八卷，則《冊府元龜》宋本之存世者，合計為五百八十一卷。此外，卷246、250、443、481還各存殘頁各一頁。中華書局已於1988年將《冊府元龜》宋刊本全部影印出版，前有《影印說明》，介紹宋刊版本問題頗詳，可以參看。

《冊府元龜》篇幅巨大，保存不易，到了明代也已難以見到。社會上流行的主要是一些傳鈔本。直到明末，先由三水文翔鳳發起，後由新昌黃國琦繼續，自熹宗天啓辛酉（1621年）起，至思宗崇禎辛巳（1641年）止，歷時二十年，始整理成一種可付刊行的本子。其間歷盡艱辛，先後訪得與借閱了十家鈔本參校，商請各地學者九十餘人幫助覆勘。黃氏於崇禎壬午（1642年）任福建建陽縣知縣時，始得本省巡按李嗣京、建南道胡維霖等人資助，才能在建陽開版，且於該年十月完成。黃家於清世祖順治時遭火災，聖祖康熙時曾補版重印。高宗乾隆時書版售與吳門書賈，其時版片蠹蝕霉缺者甚多，後經補刻，又重印過一次。與黃氏原刻本相比，文字已有所不同。中華書局於1959年影印的明本《冊府元龜》，根據的是黃國琦的原刻初印本。

由上可知，《冊府元龜》問世之後，宋代曾有三刻，明代又曾一刻。因為卷帙浩繁，價格昂貴，讀者不易求得，明、清兩代的文士很少能見到此書。我們今日能夠方便地利用此書，實屬幸事。

前已說到，黃國琦等人因未見宋本《冊府元龜》，只是利用了多種傳鈔本參校，儘管他們作出了很大努力，勘正了不少錯誤、脫漏，但還是留下了不少缺憾。中華書局影印明本之時，曾用宋本四百四十五卷的攝影樣張加以比勘，將黃刻確實脫漏的一百四十二條依殘宋本鈔錄，作為補遺，附於相應的各卷之後，這就彌補了明本的不足。

但這並不是說宋本一定勝於明本。明本畢竟經過衆多文士的反覆讎校，博尋子、史、經、傳中文字，辨析疑難，因而對於宋本中的錯簡脫誤之處，也有改正。由此可知，後人若用《冊府元龜》，最好能夠汲取宋、明二本之長。

清代以來，著名藏書家陸心源、傅增湘等人都曾做過宋、明二本互校的工作，所獲甚豐。但他們也難以全部見到存世的所有宋本《冊府元龜》殘帙和明代《冊府元龜》鈔本。而且這工作費時費力，他們也不可能花太多的時間從事於此。因此，二者互校的工作尚有待於後人來完成。

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鑒於《冊府元龜》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，目下又需要有一種經過整理的本子，遂應鳳凰出版社之請，承擔了此書的校訂工作。我們以明本為工作底本，以宋本為重要的參校本，間或參考其他存世明鈔，寫下了詳細的校記。而於宋、明諸本之不明晰處，則又推尋這些文字的本源，力求恢復這些史料的原貌。在校訂